

吳佩孚傳

◆ 郭劍林 著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卷之四

天

年

月

日



天年月日



吳佩孚傳

郭劍林 著

下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佩孚传/郭剑林著.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3

ISBN 7-5013-2998-2

I. 吴... II. 郭... III. 吴佩孚(1873~1939)—
传记 IV. K827=h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7927 号

书名 吴佩孚传

著者 郭剑林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发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30.50

版次 2006 年 3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套)

书号 ISBN 7-5013-2998-2/K·1280

定价 50.00 元

第九章

开府洛阳 直系分裂

一、幕府概念与风云际会

吴佩孚于1920年6月从湖南衡阳前线撤防北归至洛阳，到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离去，开府洛阳，历时四载，是其鼎盛时期，自诩为“余之洛阳时代”。在此期间，吴将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幕府制度^①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使古都洛阳俨然如同北洋的陪都。

吴氏曾说：古都洛阳（九朝都会），“人杰地灵”，“为十省通衢，四通八达，地理居天下之中。如果我以重兵驻在洛阳，则居中可御外，宜于武力统一全国。不仅如此，巩县兵工厂近在身旁，武汉、南京两大兵工厂也有京汉、津浦、陇海铁路之便，可以朝发夕至。练兵离不了武器，枪械、子弹，缺一不可”^②。正因如此，洛阳早为北洋军首脑所瞩目，并成为他们练兵的好地方。

① “幕”者，军中所用，建牙吹角，随军筹画之行府也。《史记》、《汉书》均有记载。“古之出征为将帅，军还则罢。理无常处，以幕席为府署，故曰幕府”。

② 张方严：《吴佩孚侧记》。

1916年初，袁世凯议定，若帝制不成，可以此地为其最后的立命之地。因此特令其高级幕僚徐世昌（时任国务卿）在洛阳建筑一座中西合璧的中国陆军大营房。该基地规模宏伟，用地颇广，在洛阳城以西，北邙南麓，伊水东岸^①，“约占地四百万平方米，耗费国库银一百七万两”^②，其中有东、西两花园，“世人所谓西工者，是因东洛阳城西兴工而得名，并非宫殿之宫也”^③。张勋、张敬尧等先后在此驻扎过军队和训练过他们的大兵。这里是有山有水的风景秀丽的中国近代营房。

1918年，皖系健将徐树铮抢先于吴师准备撤防北归之前，派“边防军”两个混成旅在洛阳驻防，以防吴师进驻洛阳。

但是，当1920年5月，吴佩孚引兵北上时，皖系驻洛边防军实行应变之策自动撤离。

吴佩孚率部“6月入洛阳”^④。7月，直皖大战爆发，吴氏迅速而获全胜。然而，他并不得志，“遂辞湘督之荐（张作霖荐其为湘督），率兵返洛阳”^⑤。

9月2日，吴佩孚率部进驻洛阳，正式开府洛阳，坐镇中原，纠察全国。吴氏任巡阅副使，巡阅使署即设在西花园内，经过一番修补扩建之后，洛阳成为他练兵的基地，并形成全国的军政重心。

吴佩孚于署前广场，建有寿国台、继光楼、广寒宫，圆顶高耸；东边建造一幢私邸；西边建造一座参谋本部，颇为壮观。在接待中外宾客的继光楼上，吴亲题一联：

① 邵云瑞译，（日）冈野增次郎著：《吴佩孚》日文1929年版，第20页。

② 邵云瑞译，（日）冈野增次郎著：《吴佩孚》日文1929年版，第23页。

③ 贾星源：《吴佩孚开府洛阳》，见《吴佩孚传记资料》（2）第47页。

④ （日）冈野增次郎著：《吴佩孚》第24页。

⑤ 吴佩孚先生集委员会编：《吴佩孚先生集》下册，台版。第388页。

得志当为天下雨，论交须有古人风。^①

吴佩孚初膺武威上将，崇拜戚公，炙手可热，物望崇隆，陇海道上，冠盖络绎，南北名士和东西洋人，竞相访洛，华夏各色人等云集，朝圣般地拥向洛阳巡阅使衙门。吴氏十分得意地赋诗写道：

欧亚风云千万变，英雄事业古今同；

花开上苑春三月，人在蓬莱第一峰。^②

他的高级幕僚长张其锬等赠诗，更是称颂、推崇备至。诗云：

渐喜神州定，应知砥柱功，

蓬莱钟淑气，海岱想雄风。

说礼思遥集，浮婴知不穷，

远邦惊将略，近世更谁同。^③

这些诗词，以及吴氏所作的画，统统挂在洛阳“广寒宫”里展示给来宾和教育部下。

吴氏开府洛阳，虎视天下，权倾一时。其宗旨是：精练士卒，统一御侮，清心寡欲，四维八德。河南铁路运输收入供其部分军政费用，壮丁20万人为其“大一统”效力。在豫军队有五个正规师、两个非正规师，每师编制为12000人^④。

这是吴氏一生的“黄金时代”、顶峰时期。如果他能顺应潮流，联合进步势力，打击反动势力，把握时机，未尝不可作出一番更辉煌、更进步的事业。可惜他有政治抱负但无实际的政治手腕，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与魄力而无将军的襟怀和技巧；他脑

① 《冯玉祥传记资料》台版第1册，第62页。

② 《蓬莱诗草》上卷，第179页。

③ 《冯玉祥与西北军》，见《冯玉祥传记资料》台版，第62页。

④ 邵云瑞译，（日）冈野增次郎著：《吴佩孚》第25页。

袋陈旧，思想冬烘，只知忠心事曹，从一而终，一心一意效忠北洋，而不能明辨顺逆，自创事业，走改革创新之路；他不能制止直系内部的分裂，首要的责任是他对北洋政府的大政方针的推行和内阁组织以及人事安排的过分干涉，而这些干涉举措往往与曹锟及其左右的意见相左。他开府洛阳，等于与保曹分庭抗礼。他发号施令，又目空一切，视津、保派为无物。从而造成冯玉祥、齐燮元、孙传芳、王承斌、萧耀南及曹锟的几个兄弟的离心离德。而吴又无心“清君侧”，把握时机，独树一帜，为自己的理想抱负而奋斗到底。相反，他受制于保派的庸俗贪枉及吴景濂、高凌霄等政客的挑拨煽动。而这些，又由于身为主帅的吴佩孚不能风行草偃，使群小洗心革面，反而使自己变生肘腋，且一败不可收拾。在每次大战取胜之后，虽曾提出某些合理的改革政治的主张、收拾时局的办法，诸如国民大会计划等，但因不能获得张作霖、段祺瑞及其他派系势力的支持而虎头蛇尾，被迫取缔。

撤防北归的吴佩孚回到保定原防地后，十三省联名通电发表了支持吴氏的倒皖反日政治主张，引起中外交相称赞，声望日隆。直皖大战后，吴氏带着喜悦的心情移驻洛阳，组织直鲁豫巡阅副使使署。下设八大处，即参谋、军需、执法、军械、政务、教育、交际、承启八个单位。各单位人才藏龙卧虎，真才实学之人殊多。具备了成就大事业的基础。吴开府洛阳的主旨是锐意练兵，而练兵的目标在抗日，以及准备再战奉张和统一西南，奉行“武力万能主义”，来完成中国的“大一统”。同时，衙门大开，招贤纳士，广开幕府，军人干政，凡事多所主张，而未能抓住民主共和的主题，酿成一幕幕政潮。

1921年8月，援鄂战争胜利后，吴受命两湖巡阅使兼领直鲁豫巡阅副使，与曹、张平级有余，署大幕多。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后，吴为直鲁豫巡阅使。此间，吴氏以洛阳西宫为

师司令部兼巡阅使署。但他只有这个本职而不兼任豫省或鄂、湘省的军政长官。这与原曹锟任直鲁豫巡阅使和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不同^①。

在中国近代官制史上，北洋时期之巡阅使在民国史上共存在12年之久，自民国元年11月27日革命党人谭人凤第一个被任命为长江巡阅使，至13年12月11日，临时执政段祺瑞正式下令撤销。它不一定在全国普设，是地方实力派的军政一体机关，其裁撤、分并无统一标准，绝不是“祖宗成制”，完全取决于地方实力派势力扩张程度，是中央对他们的一种特殊安排^②。实力派借此横冲直撞于中国北洋政治舞台。

1922年4、5月间，一次直奉战后，吴氏再返洛阳开府，以战胜者余威，声势异常显赫，“太上政府”、“专制式武力统一”，种种舆论，但是与袁、段时期性质有所不同。其对外方针，保持了民族立场，不失为“爱国军人”形象。

北洋政府设置巡阅使官制^③，无异于唐代安抚特大大地方势力的“强藩”。依照1920年10月17日公布的《直鲁豫巡阅使署组织令》^④的规定，使署设参谋长作为该巡阅使的幕僚长，此为武官衙门幕职的通称，由大总统所简任。参谋长下设若干处（一般设八大处），各处处长亦由大总统简任，并得分科办事。吴氏使署组织系统、编制机构，直鲁豫巡阅副使署以下设有：

秘书长（或参谋长）。另设东、西两厢房，作为使署各高等

① 参阅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4页。

② 钱实甫著：《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上册，第258页。

③ 该制度是一种临时性措施，是中央难以驾驭而采取的“个别立法”原则。即每设一使署，公布其组织条例。

④ 钱瑞升等编：《民国政制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81页。

顾问的议事厅（或叫咨议厅），有幕友、顾问、咨议、随办及营房副官差遣。

秘书长下设有名闻遐迩的“八大处”，即参谋处、政务处、军需处、执法处、军械处、教育处、交际处、副官处（或名承启处）。

参谋处下分五科：海军、交通、印刷、河川、参谋；政务处下亦设五科：机要、外交、财政、法律、通信；军需处下设三科：粮服、会计、铁道。科，后改为股。

“八大处”之外，计有三场（试农、养鸡、制冰）、两局（植林、蚕桑）、两所（航空、无线电）、两小处（花卉、电气）、两院（卫生院、兽医院）、一楼（继光楼，为招待宾客之所）、一房（汽车）。

各处职掌是：参谋处掌握军事计划事项，副官处掌理宣达事项，军需处掌管军需事项，军法处掌理司法事项，军医处负责卫生事项，机要处掌理文书事项，政务处总理一切，为使署军政的中枢。而参谋长则承巡阅使之命，总理署内一切事务，几等于小内阁。

吴佩孚自述其开府洛阳的用意是：

第一，中国先有辛亥之革命，汉族得以光复故土，虽标榜五族一家，然内乱频仍，尚未有开国之治绩，余愿继其后，以完成光大旧邦之伟业，即实现中华民族的“大一统”；

第二，汉高提三尺之剑以平天下，谋臣如云，智士如雨，得二百年之太平，然而物换星移，国祚几灭，幸光武振臂一呼，终存将坠之汉业，余崇拜光武而欲继光其事业；

第三，中国之事，好人不能办，恶人更不能办，惟体得“光明正大”四字之人，始可与谈时务，中国历史治国之能

臣如霍光、司马光，可称模范的人物而为我所私淑者也。^①

吴氏的言论和行动堪称“光明正大”；为了“大一统”亦无可厚非；但是袁世凯死后，他未发现新权威者，其思想与实践也难与时代精神合拍。

吴氏在京并设有“驻京侦缉处”。用以监视府、院行动及政策，洞察全国政局和动向，为洛吴发表意见，及时通风报信。

吴佩孚开府洛阳，主观上是要把中国“大一统”的事业办好，凡有一技之长，莫不兼收并蓄，奖掖提携不遗余力。确无实缺可派，暂委以顾问、咨议、帮办、副官差遣等名义。致使洛阳吴巡阅使署挂名支薪人员多达1000余名，形成一大笔开支。这既是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府不能相比，又是曹锟、张作霖保、沈幕府所望尘莫及的^②。他厉兵秣马，睥睨天下，似有做大事的雄心抱负。

洛阳使署军幕的薪俸供应不尽为“修金”或“束修”，主要由军营供俸。虽不是明文规定的官俸，亦非出自“东翁”吴巡阅使兼师长的私囊。但幕主关系的私谊性极强，所有大小、高低级幕府人员必须尽职、尽忠、尽言，只对吴氏一人负责，这在实质上与清代官衙幕宾制度并无二致。

吴氏开府洛阳，是最得意的时期。追随、汇聚在他身边的人才不仅方方面面、源源不竭；而且有“现用的、备用的和储培用的”。其人才观既具有前瞻性，又显得鱼龙混杂。吴幕起居饮食并不挥霍，米是湘产军米，质劣粗糙，“使人难以下咽，而吴氏甘之如饴，完全吞咽，从不吐出；吴每饭必酒，但经常饮的并非

① 《吴佩孚先生集》上册，台版，第312—313页。

② 曾国藩幕府人员不过百人，张作霖开府沈阳东西厢房不过三人而已，曹锟开府保定亦不过如此。

高贵名酒”^①。但为了表明幕主人的心地坦诚，有大将之风，吴创造了一种凡“达官贵人”所常有的会议式的会客方式，及仿昔日曾国藩从军行政的生活模式，洛阳幕府也采行“会食制”，即宾主不到齐不“开筵”，一顿饭至少在一小时以上，或二三小时。其日常大半的军务、政务裁决于饮食交欢之间。饭桌长二丈余，吴踞横头，其他宾客列坐两旁。

宾主交谈的内容，无一定主题。海阔天空，口若悬河，侃侃而谈。论政治涉及尧舜之王道，大禹治水之功德，“治国平天下”之要道；谈军事攻守进退之兵法；从农桑之改良到林矿之开发；从铁路水运电线交通之兴建至盐务百货之交易；以及地理、历史、时务、外交、科学、技术……无所不谈。吴有“饶舌天才”之称，凡参加“会食”的宾客，大有“宛如学生出席综合大学，以倾听蓬莱校长讲课之感”^②。借以显示其是“学贯中西”、“精博无比”的当今“伟人”。

然而，吴氏标榜“洛阳无机密”、“公开谈”并不成功。前来晋谒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碍难作秘密的报告或建议；但吴氏总认为如此公开见客，绝无私弊可言。事实上，来宾不能不有所顾忌，亦不敢畅所欲言。因为在场者有各省各方的代表，而经常在座的幕僚符定一、葛豪、杨云史、白坚武等亦极其复杂。所以，洛阳的宾客，往往是来去匆匆，或以谅解、同情与包容而交换有成；或以卖主求荣、有道德瑕疵，而真正“知己”者凤毛麟角。这是吴氏自作聪明的一大失误。如吴的动向，几乎无人不知，是造成二次直奉之役失败的原因之一。

吴幕人员招聘“就馆”的方法，重要人物多由幕主函招或

① 《春秋》第8卷，第5期。

② 《吴佩孚先生集》下册，第314页。

札委；而次要者多是自来投效。但工作均接受吴氏的分配督守。幕宾的地位特殊，不尽为吴氏私人的主要助手，甘居私宾席^①，而是随时随地因“事功”被吴氏保荐升陟，授以实缺而飞黄腾达，位至省长、总长者“不乏其人”。由于“洛阳时代”吴氏权势极度膨胀，所以使署幕府人才堪称“一时之选”，“人才荟萃”，“访客云集”，使吴往往一日须接见宾客二三十人次之多。据其日籍幕僚冈野增次郎——此人是“奉上原元帅的特别命令，在吴佩孚身边工作的。冈野受到日本部特务机关严格的命令，不准写信、也不准会见日本人等。上原元帅以他的特有的预见，早就在吴的身边安插了这样的人”^②——从1922年7月1日至1924年9月15日，两年零一个半月，统计凡人吴幕或亲赴洛阳访谒吴氏的中外军政大员、名流学者，日必数十起，以裁决时务和国内外要政。

吴佩孚洛阳幕府网罗了大批官僚、政客、名流、军人、学阀、文棍、宿彦。其影响“引四方有志政客访问洛阳者不断，嵩山洛水实成为四百余州欲求功名富贵之士流的总汇点”^③。“当时来洛阳访问吴将军者，以上自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以及各部总长、各省督军、省长，特别行政区长官及内外蒙王公、边境镇守使、特派将军等为主，其他有政客、议员、文豪、商绅、隐士、工程师等，纷至沓来，人数不可胜计”^④。“此等来访者之名片，集中在一起，装满了约一立方米体积的旅行包”^⑤。由此可见，洛阳吴幕声势之浩大，影响之深远，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以后

① 幕府制史称“西席老夫子”。

② (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天津政协编译组译：《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页。

③ (日)冈野增次郎：《吴佩孚》第355页。

④⑤ (日)冈野增次郎：《吴佩孚》第353页。

也是很少见的。他几乎成为“华夏四百州之第一人”。

一般来说，幕职在师部、使署似为附属。但在众多情况下，幕僚的责任、地位和能量确是异常重要的。他们是维持洛派势力的灵魂人物。“武夫”与“文士”相结合，互相赞襄帷幄，如虎添翼，其中不乏“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著名谋士。吴氏幕府人员，略分为如下几类：

一类是维护洛派势力发展的文人雅士、重要人物。诸如参谋长蒋百里。“文能绚云汉，武能壮干城”，号称“兵学权威”，著书满架，有《裁兵计划书》、《国防论》、《日本人》等；他人辑有《蒋百里先生文选》等。曾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授衔将军。其门生桃李，遍布军界，具领军中要职。蒋氏对吴在北洋军人中的地位自然成为得力维护力量，同时又是决定时局的高参。吴氏“援鄂战争”胜利之际，为笼络人心，抛出“庐山会议”之议。而发起此会议的“冬电”及“十三条”办法，皆出自智囊蒋氏手笔，且由他“携其草创诸文，入湘说赵（恒惕），赵欣然允诺，遂有退兵之举，而吴佩孚则乘机攻入而获岳州”^①。吴对蒋“敬礼备至”，呼为先生而不称其职位，极见友情之挚。

政务处长白坚武。1919年入吴幕，侍吴“周详勤恳，裁决当世急务如列掌无遗”^②。1921年，白向吴进献“武力统一”中国之策，因此深得吴的器重，但祸乱了全国；同年年底，梁士诒在张作霖支持下出组新阁，而“白竭力怂恿吴反对梁阁，并通电反对梁内阁，不久梁阁垮台”，一次直奉战起。“吴佩孚直系势力的日益壮大，各省军政要员来往频繁，白坚武时常代吴接见各方代表。……白坚武号称吴佩孚之‘小内阁’，成为一时的风云

① 《庐山会议中的黑幕》，见《民国日报》1921年9月15日。

② 《白坚武自撰小传》，见《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1期，第111页。

人物”^①。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白随吴入京在“四照堂点将”，吴乃“太上皇”，而白却“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比国务总理威风许多。“吴亲口许诺，俟东北平定后，保荐白氏组阁”^②。因战争失败，白阁成为泡影。战败后，吴白在乘舰浮水南逃途中，讨论时局，白说：“军事虽败，政治不可无主张。吴帅初以勤王（王指曹锟）之义为言，余言曹总统声誉不佳，不足以资号召，且战争系国家事，非为一、二人。酌量审慎，护宪之议乃定。至其方案，大体系余所概定，起草者乃光君明甫也。”^③这就是1925年吴佩孚岳州东山再起，“建立护宪军政府”的一幕。当时白再任吴氏“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政务处长。迨1926年吴氏主力被北伐军击溃，吴逃往四川时，白才离职，东渡日本，后来成了汉奸。

“驻京侦缉处”处长孙丹林。“此人是吴佩孚的诸葛亮；吴氏得有今日，大半是他的功劳”。“攻段之计，与去徐（树铮）之计，都是孙氏出的主意”。孙遇事开导吴，“颇能变化他的性情”^④。

高等顾问郭梁丞。是吴氏山东老乡，第一次直奉战争升任使署秘书长。郭以一介文人为吴氏舞文弄墨，起草电报稿；同时为军旅运筹帷幄。吴对郭言听计从，“结之以恩义”。“郭为吴谋甚忠，持议侃侃，吴恒降意相从，而服其擘画之当今事情焉”^⑤。吴曾荐郭任山东省长，“惟才是举”，报之以德，但未就即歿。

①②《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91页。

③《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1期。第107页。

④《胡适的日记》（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2页。

⑤《一士谭荟》，见《近代稗海》第2辑，第458页。

一类是以相当的政治地位联络四方之三教九流人物，使之与吴结为奥援者。如吴幕中首屈一指的幕僚张其铨（进士出身）。吴佩孚一生的关键是1918年衡阳前线“罢战主和”和随后的“撤防北归”，倒皖反日。而此举与张氏的极力游说关系极大。吴得张的说合，乃联络湘、粤、桂军人谭延闿、谭浩明、莫荣新辈，组成“救国同盟军”，为直皖战争的胜利作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充分准备。吴氏全盛之时（1922年6月）曾荐张为广西省长，倚为西南屏卫，而厚之以爵位，“长才方为世用”。但张氏之才，限于幕职，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张氏又精于杂学^①，吴得张“杂学之益”者颇多。如直皖之役吴用张计诱捕了皖系大将曲同丰。又如1924年，二次直奉之役吴战败，张向他进言：（1）改武力统一之标榜；（2）今后宽容政客要人，苟有主张之士，虽政敌亦敬重之，尤不可加以斥骂；（3）在洛阳以外交通便利之处，另行选择根据地；（4）亲贤远佞，征用人才；（5）筹银300万元以应目前急需^②。除第三条外，吴氏全部采纳，因此演出一场岳州东山再起的好戏。张在吴幕是最有发言权的，每以去留力争，是“超凡魅力”式人物，但于1927年5月27日，在吴氏兵败入川路上，“张其铨先行至魏集，遇土匪索金娃截击阵亡。”^③从此，吴再失一右臂辅助之力。

机要秘书杨云史。1921年入吴幕，“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宾主异常相得，如鱼水之欢”。语为：“诗歌出忠爱”、“大事不

① “于先秦诸子及周易、阴阳、太乙、壬遁之学，无一不通”，吴对他“事以师保之礼”，“受其指点迷津”。

② 《吴佩孚先生集》下册，第409页。

③ 《重修邓县志》，转引自《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

糊涂”^①。湘鄂、直奉、榆关、联军、武汉各战役，大小数十战，杨氏相从，运筹帷幄。吴称他“杨君庙堂姿，才识天下冠，胸中富文史，蔚蔚锦绣段”。但杨对吴批评说：“向来治学驳杂而不纯，好谈迷信；又于现代政治，少所认识，是以虽居恒傲岸自负，而实际去现世甚远，不足语学者通人或政治领袖之列。”^②“去现实政治甚远”这是对吴了解很深而批评极公允的。

他如使署、师部工作班子——参谋长李绰章、参谋处长张方严、外交处长张志潭（曾任内务总长）、财政处长张英华（曾任财政总长）；交通处长高恩洪（曾任交通总长、财政总长）、政务处帮办张伯伦（为吴氏整理《蓬莱讲话录》）以及吴氏同乡同学同榜张佐庭、汪天铎（竞庵）、黄士龙（莘田）、唐恩溥（天如）等等，皆一时俊彦之选。这些智囊团的工作效率高，活动能量大。他们“每日每人办二三十件，办事之迅速，素所仅见”^③。

一类是各方各省常驻洛阳代表。他们均入吴幕，互通声势。诸如湖南湘军总司令兼省长赵恒惕的代表葛豪，以赵氏代表任吴氏副官。葛氏“自命为既帮助了直系，又保全了湖南”^④。他忙碌地奔走于长沙和洛阳之间，充吴赵的联络人员。四川军人杨森的代表刘泗英任吴氏秘书处处长，一直跟至北平沦陷，身陷日人虎穴又逃走。1939年元旦，刘泗英再携孔祥熙亲笔信入京见吴，劝吴不要与汪精卫合作，不为日、伪所利诱。老朋友相见，悲喜交集，吴亲笔作函，托刘带复孔氏，信中有“处境安如泰山，应付绰有余裕”之语^⑤；及江苏督军齐燮元的代表田文渠、福建督

①②孙丹林：《吴佩孚与杨析》，见《当代人物志》1947年。

③《吴佩孚先生集》下册，第329页。

④汤芑铭：《直皖战后直系势力的扩张》，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第791页。

⑤《吴佩孚先生集》上册，第61页。